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蒋介石的大囚徒实录

作茧自缚胡逸民

“清党”主席入狱揭秘——不容青史尽成灰

胡逸民

- 明白人喜得糊涂官
- 下马威通缉郭沫若
- 唱反调糊涂官干“糊涂”事
- 吃耳光丢官下牢狱

“功劳”苦倍受蒋赞许

1926年3月，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军事总监兼第一军军长的蒋介石，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说是共产党要赶走他，20日凌晨突然宣布戒严，共产党人受到逮捕和监视。听说共党陈延年等人主张武装还击，但受到总书记陈独秀的“劝阻”，最后不了了之，共产党人退出第一军，其他一些共产党要人也被撤去要职。这实际上是国民党清党运动的序幕。此后，蒋介石的清党排共独裁行动，已在明白人的意料之中，只是还没听说过有什么专管清党的组织机构。

7月15日，广州誓师北伐后，我被委为总部军法要职，跟随蒋介石的北伐军一直打到上海。1927年2月总部进驻上海龙华。3月，曾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和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要人周恩来，领导、组织、发动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使正在与上海滩头面人物和洋人频频接触的蒋介石十分不安。当时我并非核心人物，对其幕后交易不知其详。据内部传闻，这突然袭击的“四一二”事件，蒋介石的把兄弟黄金荣和杜月笙帮了大忙。4月12日这天，黄、杜控制的大批帮会人物、流氓泼皮，扮成工人、学生模样，袭击工人纠察队武装。二十六军周凤岐部即奉命神速进入预定地点，以“工人内讧”为由，将纠察队全部缴械。冲突中当场击毙纠察队员38人，打伤约3百人。仅11、12、13，3天就有3百人被杀，近7百人被捕，失踪者超过6千人，当时我是总司令部手执军法大权的执法、监狱两科的科长，突然而来的大量审讯、监禁和执行工作，使我无法应付，许多案件只得草草奉命执行，有的连真实姓名都未搞清楚就枪杀了。据我所知，被捕杀人大部分是一些出头露面的普通党员和工人，真正共党要人并无落网。这期间，我配合默契，办事果断，既有“功劳”，也有苦劳，因而倍受蒋介石赞许。这大概就是不久后，我能轻而易举地得到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高官的政治资本。

明白人喜得糊涂官

“三二”事件的成功，“四一二”政变的得逞，使蒋介石基本上控制了局势，我们开进南京，4月18日正式宣布成立国民政府。清党在继续大规模进行，但还来不及组建专门负责清党的机构。所以，第2天匆匆宣布的第1号通缉令，是以国民政府名义签发的。名单也是蒋介石亲自圈定的。记得被通缉的全是共产党的头面人物，还有国民党中知名的左派人士，包括原北伐军政治顾问鲍罗廷、军事顾问加仑将军、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等190人。

4月20日AB团头目邓泽如告诉我，他同段锡朋组织了一个清党委员会，只有九名成员，蒋介石自兼主席。这是钦定的核心组织，我并无跻身其中的奢想，不料27日上午接到通知，我被委为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委员会成员好象是15人，骨干有刘伯龙、伍瑾璋等人，除我而外，是清一色的黄埔系军人。我这个谙熟蒋介石内幕的明白人，居然就此糊里糊涂登上权压朝臣、手操生杀权柄的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的宝座。不过，我这个非嫡系人物何以能不费吹灰之力雄居高位？令人纳闷了半个多世纪。现在细细品味起来，大概与下列原因有关：一、清党审判委员会其实是清党委员会的执行机构，除了侦查、监禁、审讯和执行既定清党对象外，并不是权倾朝野的核心组织，说穿了只不过是蒋介石清党反共和独裁的一柄大砍刀而已；二、起用我这个也算民国元老又非嫡系的人，可以在外界造成清党并非蒋介石控制的黄埔军人一统天下的印象；三、我是由蒋介石的好友吴稚晖推荐的人，自然是可靠的，也是买吴稚晖的面子；四、北伐以来我随军执法不遗余力、配合默契、紧跟不舍，深得蒋介石青睐，况且我也是浙江人，算是大同乡，很合蒋的“用人原则”；五、还有一条，当时连国民党内也确实难找象我这样专攻法学、科班出身而又信得过的人选，由我出任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自然会给这个旨为戮杀革命志士，并不需要法律的“鬼门关”披上了依法行事的外衣。以此而言，这个“刽子手”的席位真是非我莫属了。

下马威通缉郭沫若

我和委员们偶得高官，不胜侥幸，弹冠相庆，遂由我作东畅聚一番，此举初衷，我无非是笼络人心，以利彼此和衷共济，于点名堂出来，以报效党国和蒋总司令提携之恩。上任第3天，伍瑾璋偕刘伯龙（还有一位已忘是谁）3位委员匆匆来到我办公室：“这是要你签发的，你过目一下。”瑾璋递过一本用毛笔写的名册，原来是“钦定”的通缉名单，开卷第一名“郭沫若”三字赫然在目，连邓演达都在其中，共约210名。见到这北伐军总政治部正、副主任都上了黑名单，不禁令人愕然。但想到自己是三民主义忠实信徒，而郭沫若是共产党要人，既然清党，连陈独秀都通缉了，他郭沫若当然难脱干系，况且我是奉命行事，签发之举不过是过过手续而已，所以就顺理成章地以主席身份签发了通缉令。这大笔一挥，不知使多少革命志士和有为青年惨死于血泊之中；至于我管辖下的各大监狱，非人的折磨和暴满之状，更是难于言表了。

连续的日夜审讯，把我弄得焦头烂额。经手审理的一批青年人，好象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面对我这堂堂法官的提问，一问三不知，对我的指控，矢口否认，尽管用尽酷刑也无济于事。更可笑的是，我连他们的真实姓名都无法搞清楚，根本难以形成口供笔录。我以为这有悖法律，加之对这些人的铮铮侠骨暗自佩服，不忍就此操刀，就以“证据不足”为由，陆续将他们取保释放。事实上，那时我不是、也不敢真正去开脱“异党”，更多的是从法律角度考虑。事后得知，这些人倒真正是共产党，确确实实由于我的“开脱”而免遭杀害。对人民来说，这是历史赐给我的“功劳”。

唱反调糊涂官干“糊涂”事

6月的一天，清党审判委员会举行全体例会，我以主席身份，对同僚们前一段工作做了一番嘉勉后说：“我主张被捕之人必须有证据，而进行共产主义活动的，方可扣押坐牢，如被诬告，应申明立即释放，决不可随意杀人。”这班正襟危坐的委员们嘴上唯唯诺诺“是的，是的”。唯独刘伯龙有异议，一本正经地说：“诸位，校长（指蒋介石）在南昌说过，对共党……”

“我知道！”不待他说完，我就接过话茬：“从法律程序而言应该这样。我自有主张。”此刻，经刘伯龙提头，我始知自己说滑了嘴。蒋介石在南昌确实说过“对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可放走一个”的口谕，刘伯龙被我打断的半截正是这句话。明知自己健忘，干了糊涂事，与蒋介石唱了反调，但自恃依法而断，法官之道是无懈可击的。为维护自己这个主席的尊严，我硬着头皮，不容委员们插话，把我的主张正式抛了出去，要他们照此执行。就为这句话，我这个威赫一时的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顷刻间从高台上摔了下来，锒铛入狱，沦为阶下囚。

提起这个刘伯龙，不愧为“地煞星”。此人黄埔3期，陆大特别班2期毕业。年轻时就嗜杀成性，或以睚眦之怨杀人，或以无故杀人为乐，算得上杀人不眨眼。据说后来在康泽麾下泡制过几桩戮杀平民的“政绩”，不知有多少共产党和无辜平民惨死在他的屠刀下，故世称刘伯龙为杀人狂。1950年初在北京时就听说，刘伯龙于1949年11月在贵州被谷正伦所杀，暴尸于野，这也算是恶有恶报吧。想当年，我虽是他的顶头上司，也险些死于他手。

吃耳光丢官下牢狱

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该我倒霉的事终于到来，7月中旬的一天，蒋介石紧急召见，我匆匆来到他办公室。只见蒋介石绷着脸，背着双手在屋子踱着方步，旁若无人，室内笼罩着一派杀机，我感到有点不对头。自古道：“伴君如伴虎”，观此气势，我直冒冷汗。正想开口报告，只听“呼”的一声巨响，蒋介石击案训斥：“对共党格杀不论，宁可错杀，不可错放！你为什么要放走大批共党分子？你清党是怎么清的？嗯！”

“我……”虽想斗胆回禀原委，却已无此勇气。只听“拿下”一声怒吼，便被侍从们捆绑结实推了出去，投入监狱。直到年底才由张群讲情释放，算是了却了半年牢狱之灾。

自从1927年4月21日荣登高位到7月锒铛入狱，我在这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的宝座上总共坐了93天，这段人生浮沉，也弄不清是历史的误会还是误会的历史。该不是宦海奇梦吧！

三番建狱四次坐牢的国民党中央监狱长
胡逸民

- 初发迹操生杀大权
- 入囹圄偶度铁窗岁月
- 再入狱反招人财两得
- 得肥缺官禄财星高照
- 三坐牢义交方志敏
- 三建监出洛阳再立“功”
- 会汉奸同作虎牢吟
- 春雪动又得死里逃生
- 怕清算偕女弃家外逃
- 鬓如霜百岁落叶归根

初发迹操生杀大权

孙总理治丧事宜完成后，于右任把我推荐给当时担任福建省主席的林森，不料吃了闭门羹，于是我就投入了此时已参加蒋介石阵营的吴稚晖的怀抱。

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15日，花城广州，晴空万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扫除封建势力”的口号响彻云霄。这天上午，蒋介石在广东省议会，举行出任北伐军总司令就职典礼。当场委任李济深、白崇禧为正、副总参谋长，何应钦、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程潜、李宗仁为第一军至第七军的军长。总司令部秘书长和八大处的处长也同时任命：秘书长马文东，参谋处长张定璠，副官处长张治中，交通处长陆福廷，军需处长刘纪文，运输处长俞飞鹏。令人奇怪的是，惟独那操生杀大权的军法处长暂缺。大概是元老吴稚晖的推荐，蒋介石居然破例在这只委任高级军职的就职典礼上，委任我为军法处执法和监狱两科科长，让我实署军法处长实权。我由一个小小广东曲江地方审判厅推事，一跃为北伐军总部操生杀大权的铁腕人物，不觉踌躇满志，飘飘然起来。此刻，虽位不列权臣，人们却对我刮目相看，成为北伐军内令人害怕的人物。背地里人们称我“刽子手”我很引以为自豪。

7月27日，北伐军挥师北上，我随军执法，好不威风。势如破竹的北伐军，9月取安源煤矿，11月7日攻克南昌，生俘江西军阀虞香亭部军长唐福山、师长张凤歧。我毅然以北伐军军法处长的身份，与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一起审讯张、唐，并由我宣判两犯死刑，立即枪决。这次对军阀初开杀戒，使我名声大震，眼看就要青云直上。殊不知，在这节骨眼上，杀出一个“程咬金”，我的形象在蒋介石这个总司令心目中，开始留下一缕阴影。

原来，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以为南方大局已定，脚跟稳了，就在这里筹建行营，开始招降纳叛，搜罗人马，准备清共。这时陈果夫、张群应邀入赣，蒋封以总参议高位。随陈、张而来的，有一人叫王振南，此人并无资历，无非是侍卫长王世和的亲叔而已。蒋介石突然委以总部军事法官兼署军法处长之职，位居我上。我这个俨然是处长的执法、监狱两科科长，从此得向王振南“称臣”，不免心中不服，耿耿于怀。

我比蒋介石早四个月投奔孙中山，论资历比蒋老，论学识，我是科班出身的民国元年法学士，且对蒋介石的底细，我了如指掌。只不过蒋介石权术过人，又深得天时。民国15年中山舰事件后，他一举连歼陈炯明、杨希闵、范石生等军阀势力，居功自重而飞黄腾达，身居高位。我则依老卖老，并不把这位总司令放在眼里，许多事有意无意要同他唱唱反调。也许这就是我一生四次坐牢的原因之一吧？

北伐途中，有一回第三军朱培德部的朱贵师长，率百余人闹军饷，包围了蒋介石驻地，侍卫团将这些人统统抓起来。蒋介石火冒三丈，下令“统统枪毙，一个不留”。我奉命传讯后，认为事出有因，就自作主张，只处决了其中为首的23人，放了70多人。事后蒋介石对人提起此事，总是似笑非笑地瓮声说：“哼，胡逸民这小子……”

蒋介石蓄谋已久的清党运动进行得很顺利。四一二政变得逞。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当时发出的第一号命令就是通缉苏俄顾问鲍罗廷和陈独秀等190余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AB团头目邓泽

如、段锡朋奉旨组织清党委员会，也许是蒋介石确实认为我追随执蹻有功，或者是因为我是党国法学士、“监狱专家”，外加点安慰之意，事先竟无风声地突然委任我为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兼江苏第一模范监狱长之要职。

我春风得意，果然爬上权力高位而出人头地了。走马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签发了对郭沫若等共产党人的通缉令。我管辖下的监狱，人满为患，眼看共产党、革命志士和工农群众的鲜血即将染得我顶子殷红，想不到竟会祸起箫墙。

入囹圄偶度铁窗岁月

清党审判委员会的委员中黄埔系军人占多数。如伍瑾璋、刘伯尤这班人都是，他们与总司令蒋介石有师生之谊，根本不把我这个平步青云的主席放在眼里，加上我办事向来自信，很不听“忠告”，这伙人心中十分不服。可是如今我毕竟雄居主席高位，令其奈何不得。背地里他们密谋策划，千般寻找把柄，欲置我于死地取而代之。

我果然授之以柄。一次清党审判委员会举行例会，针对当时被捕人太多，我以主席自居大咧咧地说：“我主张，被捕之人必须有证据是进行共产主义活动的人，方可扣押坐牢，如被诬告，应审明立即释放，决不可误杀一人。”这班委员当面唯唯称诺。我当时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主张同蒋介石一年前在南昌讲过的“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可放走一个”的谕旨大相径庭。

1927年7月，蒋介石陈兵津浦路，力拒南下，北军功亏一篑，汪精卫又通电反蒋，蒋军兵败徐州。此时的蒋介石心慌意烦，情绪暴躁，喜怒无常。正好此时接到几份“胡逸民有通共之嫌”的详尽密告。“岂有此理！”蒋介石火冒三丈，击桌而起。

这天，我应召来到总司令部办公室，只见蒋介石铁青着脸，眼露杀机，足足有两分钟怒目而视不发一言，周围的空气好似要爆炸一样。见这光景，我自料凶多吉少，吓得一身冷汗。“嘭”的一声，蒋介石拍桌怒吼：“你，你竟用共党分子做私人秘书，嗯？”细长的食指几乎戳到我的鼻尖。

“不，只不过是我的一个同乡而已。”我小声回答。我的私人秘书确是永康同乡，他参加过共产党，事先我是知情的。至此我料自己并无多大过失落在对方手里，量其奈何不得。只因蒋介石正在气头上，凭经验不硬顶不多加解释，估计一旦气消即可冰释。

想不到蒋介石听了更加怒不可遏，左右开弓，“啪，啪！”甩了我两个响亮的耳光：“你受共党分子操纵，哼！”

“逸民效忠党国，尽心尽力。”

“放屁！”蒋介石目射凶焰、唾沫四溅，大声训斥：“对共党格杀勿论，宁可错杀，不可错放！你为什么要放走大批共党分子？你清党是怎么清的？”

我的几番自辩，使蒋介石越发恼怒，大喝一声：“拿下！”侍从室的三、四名年轻侍卫闻声而入，一拥而上，不容分说，将我捆绑起来，推了出去。

不过，我确定并无什么大不了的把柄留下。蒋介石拿办我，其实同当时形势有关。8月李宗仁通电反蒋拥汪，蒋介石被迫下野。9月蒋东渡扶桑，以避锋芒，军事上由李烈钧、何应钦、李宗仁负责。此时，我通过关系，不失时机地把契友张岳军（群）总参议抬了出来。1927年冬，由张群讲情我被释放了。

经过这番折腾，我开始有点心灰意懒。适好巧遇父丧，便乘机告假返里奔丧，怀着官场失意之苦，中年丧父之悲，灰溜溜地离开南京，作故乡行。

再入狱反招人财两得

丁忧届满，离乡返宁，途经杭州时，又糊里糊涂地被捕，莫名其妙地关入杭州陆军军人监狱。后被告知的罪名又是“通共”！这真使我啼笑皆非，原来伍瑾璋、刘伯龙自上次告密得逞后，以为我从此被置于死地，他们没有想到，我也来头不小，居然能从“天牢”中破门而出。他们担心我东山再起，遂串通浙江军事厅厅长蒋伯诚，以通共罪名将我在杭州截捕。

此番再次入狱，才使我这个民国以来主管狱政的人饱尝人间地狱的真正滋味。中国的监狱，大抵与佛教里的地狱有关，狱中一切似都是以要囚犯受苦为宗旨的。因为这次我无法获得狱中的什么优待，着实吃了点苦头。“太黑暗，太腐败了！”那时我想，有朝一日如能重掌狱政，定要大斧改革，非创个模范监狱不可。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在什么山唱什么歌。我后来果真重掌狱政时，搞的所谓“模范监狱”又是如何呢？我自己后半生的经历，便是最好的回答。

在杭州狱中我度日如年，几次写信求救于李烈钧，均不见动静。后来得知，李确曾致电蒋伯诚，要求立即释放我，但因伍、刘之辈从中作梗，蒋伯诚亦不买账。

1928年春天，浙江军事厅厅长蒋伯诚突然接到南京急电：“速放逸民嘱速来京晋见蒋中正”，蒋伯诚岂敢抗旨！这回又何以化险为夷呢？这同蒋介石的“双喜临门”有关。1928年1月，蒋桂联盟，汪精卫败北，蒋成为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领袖——此一喜；另一喜是蒋、宋联姻，蒋介石与宋美龄新婚燕尔。蒋介石心情好极了。此时出任秘书长的邵力子，接我求救信，及时地向蒋介石恳切陈词相求，终于获准将我释放。

昨天还是阶下囚的我，兴冲冲到了南京，先见邵力子，当天又由邵陪同晋见蒋介石。

“嘿，嘿，嘿，逸民你受惊了。”蒋介石笑脸相迎，说了一番宽慰的话，当场委我再任军法处监狱科长之职，可是那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却避而不提。我明白，自己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已是今非昔比了。不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若以此为转机，何愁不能卷土重来？哪里还去嫌官大官小，唯有频频叩谢“圣恩”而已！

得肥缺，官禄财星高照

2月中旬，蒋军攻克徐州后，军内人犯骤增，蒋介石带着我到徐州。我连日审讯，忙得不可开支，但监狱人满为患，难免不大伤脑筋。这天蒋介石突然决定兴建徐州军人监狱，当即拨交我现洋75万元，命我火速造监。

这是一桩令人垂涎的肥缺，一本万利的好差事。我大展“才智”，监狱营造得十分顺利，还从中捞得25万元外快。我腰缠万贯，财壮气粗，常常忙里抽闲、轻车简从，来往于徐宁道上，混迹于秦淮青楼。并用这宗“地狱钱”，在南京四牌楼其昌里买下一幢豪华住宅，以金屋藏娇，纳鲍氏为姨太太。

我营造监狱倍受蒋介石赞赏，视为心腹。1929年3月12日，奉蒋密令，我诱捕李济深于南京鼓楼，立下奇功；12月3日唐生智、冯玉祥倒戈反蒋，蒋介石又处在汪、阎，冯、李、唐联合反蒋的态势之中，危急万分，我审时度势，欲再建殊功，以示对蒋忠心不二。12月下旬的一天，我秘密赴河南南阳，找到了当时任杨虎城部旅长的契友冯钦哉，巧舌如簧，劝冯倒戈，迎击唐生智，冯钦哉果真就范，欣然应允，并获杨虎城默许。除夕夜，冯玉祥军主力杨虎城部以三个团兵力，突然袭击友军——在驻马店的唐生智部，弄得唐生智措手不及，被迫于1930年元旦化装潜逃天津，流亡香港。联合反蒋的态势就此瓦解。为这事，蒋介石专门召见我，连连称赞“逸民真有两下子！”“很有才干”“此功不小呵”，允诺要好好犒赏。

不久，果然传出谕旨：新建成的徐州军人监狱可由我委任监狱长，同时又拨巨款，让我再造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还事先委于右任为监督，预委我为监狱长。这回我又捞到了几十万，买下几处别墅。洋房、汽车、姨太太……奢逸更非同一般。

从1928年春至1934年7月这6年半时间，我虽经历两场虚惊，却也能两番建狱，发了大财，出足了风头。此间我还奉命拉拢杨虎城，一度入陕，出任杨虎城主政的陕西省政府委员和杨虎城部驻京办事处主任。官运又亨通，财星再高照，在西安，由杨虎城主婚，我又将一个几乎是我女儿辈的女大学生何××纳为二姨太；在南京又独占了穆××为外妇，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三坐牢义交方志敏

1934年7月，我正在南京快乐逍遥，突然接到蒋介石发自南昌行营的召见电，还以为自己在南阳策反冯钦哉有功，又有封赏，兴高采烈赶到南昌晋见。刚见面，只听得蒋介石大喝一声：“拿下！”就被侍卫擒住，当天就被莫名其妙地甩进了南昌行营北营坊看守所。几天后才探知，我是当了替罪羊。事从杨虎城而起：彼时杨无端撤去马苑青的警备师师长之职，马是我的好友，当年是由我引荐给蒋介石的。为此事我到处张扬，大骂虎城不仁不义。而蒋介石另有盘算，他惟恐杨虎城有变，为讨好和稳住杨虎城，听信了熊式辉之言，略施弃车保帅之计，于是我便锒铛入狱。

这是我第3次造监自囚。这次从1934年7月到1935年9月，在狱中足足蹲了13个月，与方志敏同囚相交216天。

我虽为阶下囚，却也人情遍地，况且看我已三进二出，人们惟恐我再度出山，多少留些后路，看守长对我这个昔日的顶头上司很是尊重，13个月的铁窗生活，居然没有受折磨，堪称狱中特殊人物，颇有圈圈里的自由。

回想起这段牢狱之灾，其实倒应有庆幸之情。它成为我此生的真正转机，这就是狱中我做了3件事——也许这就是今天人民对我如此宽待厚爱的原因吧；义交方志敏；为方志敏策划越狱；传递方志敏遗稿。

那是我入狱半年后的一天，1935年1月30日，一群荷枪实弹的武装，冒雪押来四个拖着重镣的要犯。他们就是3天前被国民党军捕获的共产党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的领导人方志敏、刘畴西、曾仰山和后来叛变的王如痴。我目睹四位共产党大官，当今钦犯，一个个大义凛然，暗暗肃然起敬，好奇之心油然而生，便决心要伺机相聚，见见世面。

第二天，我踱到方志敏牢前，连叫了几声“方先生”，可是得到的回答是方志敏那警觉、蔑视的冷眼。但我不死心，还是想办法打通关节，得以同方志敏单独会晤。不断的见面，交情也就渐渐加深，无所不谈，彼此以“老方”、“老胡”相称。方志敏同我讲了北上抗日的意义和蒋介石背叛革命的事实，直言不讳地说：蒋介石是破坏革命的罪人。

有一天，顾祝同带着蒋介石要我“劝方自首，将功折罪”的口谕来狱中找我。我将此事通知方志敏。方愤愤地说：“投降？真革命者只有被敌人残杀，没有投降的。”我照实回复顾祝同。

7月，盛夏的一天，蒋介石亲驾北营坊，命人打开方志敏脚镣，叽哩咕噜谈了许久，未了怒气冲冲而去。蒋介石前脚出监，我就接踵我方志敏问：“怎么回事？”方淡淡地说：“无非是劝降，我只回了一句话‘你快下命令吧！’老胡啊，能这样死很痛快嘛！”

其实，方志敏并不象现今流传的那样坐以等死。一次，方悄悄地告诉我，决定来一次冒险的越狱行动，要我帮助安排，我不加思索，出于义气，满口答应。用五百块钱买通看守，为方志敏打开脚镣，当晚乘夜黑人静，引他逃出看守所，可是刚溜到门边就被哨兵发现，又重落罗网。

过了好几天，狱中由于越狱造成的紧张气氛稍有缓和，方志敏就拉我在他床边坐下，恳切地说：“老胡，也许最后一次交谈了，我俩几个月的谈话不要随意外传，放在脑子里好好想一想。”说着从床底抽出一大卷纸塞在我手中，郑重地说：“你是一定能获释的，我们总算有过囚友之谊，拜托你，出狱后将这些东西交给上海四川路的鲁迅先生。”

1935年8月6日，我目睹方志敏带镣被押出监，当天被枪杀。我闻讯百感横生，有生以来第一次为朋友丧生而泪满衣襟，自己也搞不清是义气还是情谊，是愤怒还是敬佩。

1935年秋，我由中央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求情释放出狱。几天后，我不负亡友所托，在上海四川北路一片小菜馆楼座，将那卷纸亲手交给鲁迅派来接头的章乃器、胡子婴两先生。这就是以后由鲁迅传延安流传至今的方志敏遗著《清贫》、《可爱的中国》和《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

三建监出洛阳再立“功”

我出狱不久，便官复原职。蒋介石又电令湖北省主席夏斗寅拨巨款给我，由我全权负责营建汉口军人监狱。这是我建造的中国现代第三座大型监狱。这自然又是一大肥差，事毕之后，我的长兄胡文通被委为监狱长，我自己则溜回南京享乐去了。

转眼到了 1936 年 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爆发，南京朝野乱成一团，居然又有人想到我胡逸民了。

大约 15 日，军政部长何应钦、陆军大学校长陆培根、特务头子戴笠 3 人突然登门造访，说要我火速北上搭救蒋介石，还说此任非我莫属。我也误为又来了飞黄腾达的机会，就以身负“特殊使命”飞洛阳去潼关。

潼关是西北咽喉之地，军事重镇，由西安事变发难人杨虎城部的十二师驻守，师长正是我那莫逆之交冯钦哉。见了冯师长，我开门见山以高官厚禄相许，巨额金钱收买，终于诱使冯军退至同州一线，潼关遂被陈诚部樊崧甫师占领，给杨虎城在军事上造成不利之势，成为蒋介石以潼关军事之优势向张、杨讨价还价的筹码。由于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策反冯钦哉倒戈叛杨，使西北军部队除十五师师长孔从周率部投共外，全部瓦解，杨虎城被迫出洋。

此番汗马功劳，朝野莫不翘指称道，万万想不到，蒋介石对此竟毫无表示，我那重入政坛的念头遂成泡影，回想起方志敏生前之言，殊觉蒋介石不仁不义，从此复出之心泯灭。

1937 年七七事变后的 4 个月零 8 天，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重庆，达官贵人都匆匆作陪都之行。连我的何姨太都跟毛人凤赴渝作了毛的抗战夫人！

这时，昔日的六朝故都，在和平门外曹后村和太平门外玄武湖畔竖起了两块招牌：“并耕农庄”“大士农场”。后者是国民党元老陈铭枢先生所办，前者正是我这个失宠军法官所创。“并耕农庄”匾额由于右任手书，还为我亲书“心积和平气，手成天地功”一联，意欲从此在铁蹄下偷生，躬耕自食不问政事。此刻的陈铭枢先生与我同气相投，不谋而合，所见略同，来往甚密。又谁知这竟是 4 年牢狱之祸的契机。